

当代中国城市形态的激变 - 关于社会转型时期北京城市发展的文化境况

陈宇飞教授

一、中国传统城市形态的历史依据和社会前提

根据史料记载和考古报告证实,中国最早的城市大约产生于原始社会末期,正是历史传说中的黄帝时代,考古文化上的"龙山文化"时期(公元前3000—前2000年),距今约5000年.在考古报告中还有湖南澧县城头山城址为我国所知最早的史前城址,距今约6000年(公元前4000年"屈家岭文化"),说明当时已有最早城市出现,但考古报告仅有个例。¹

最有中国文化意味的城市类型,是依据统治要求营造的都城,即行政中心城市,《左传·庄公二十八年》曰:"凡邑,有宗庙先君之主曰都。"《释名》曰:"都者,国君所居,人所都会也。"²说明都城的核心是国家概念产生后的国君居处的神圣之地,其"官方"意味非常强烈,以至非常深刻影响着城市的产生、构成和运行方式,从城市规划、建设组织、居民成分,无不体现着浓厚的君主和统治者的"官方"意志,考古资料报告的中国最早期城市河南郑州、偃师、山西垣曲、湖北黄陂四大商城,以及称誉世界的历史名城唐代的洛阳和长安城、宋代的东

京汴梁城、元明清的北京城等,它们产生并形成最终规模的的政治意图要超越其他任何意图之上,而成为政治权力的象征。

历史学家张光真先生认为,"中国最早城市的特征,乃是作为政治权力的工具与象征。"他还引述费孝通先生为近代中国城邑所概括的话强调说明,"在权力居于武力这种政治系统里面统治阶级的一种工具.它是权力的象征,也是维护权力的必要工具".认为,"这个界说,是完全适用于中国最古的城市的"³正是基于此,中国传统行政中心城市的格局、形制、建筑风貌,都坚决服从这一要求,忠实的体现了权力意志的威严和权威性.因此,这些城市的着力点全在于突出权力和贯彻权力,形制、布局、风格都是规格严整,中心突出。

中国历史上有一部工程指导性专著,叫《考工记》,春秋晚期时在社会流传,后被收入《周礼》一书,其中有对城池的规模、形制、格局的规定性描述.其重要内容是:"匠人营圆,方九里,旁二门,国中九经九纬,经涂九轨,左祖右社,面朝后市".这种描述被认为是后来所有都城建设的指南.但实际状况并非如此,在后来的具体实践中,都城的营建都会

根据客观条件做新的规划,事实上没有完全按照《考记》模式建造的城市。⁴所以认为中国传统都城都是严格按照正统格局规划,都呆板不堪的说法,并无客观依据。

二、北京传统城市形态的意义构成

城市形态的意象性十分明确,是我国传统型都城的重要外部特征。形式是为内容而设计的,受到材料、地域文化、气候和审美理念的制约。北京城坐落于平缓开阔的华北大平原,格局平直方正,规规矩矩,是典型的网格型城市:宫殿巍峨壮丽,其城市布局 and 建筑形态风格端庄严谨,次序有度,形制完整,相似中有区别,对比中有和谐,砖、木、瓦为主的构件形式,构成合理,色彩浑厚凝重,沉稳方正,大小有别的坡屋顶整合成典型的中国古代城市的宏伟画卷,显示了设计者高超的智慧和从容的心态,文化气息和蕴涵深厚浓郁。

据一般的认定,北京作为北方人类的重要聚居点已有3300年以上的历史,而建都的历史也超过了800年。在建设的过程中,它不断地吸收中华民族各兄弟群体的优秀文化成就,融合东西南北各个地域的成功经验,并通过征调各地优秀工匠的方式将优秀的技艺,带到北京,以整个城市和城内万千大小建筑的形式把当时最优秀的文化加以实现。从建城理念看,北京是对传统的如唐宋诸代皇

城的良好继承,又有它自己的创新;从建筑形式看,它也是中国传统建筑形式的良好继承,虽然它的气象比不上唐长安城,建筑也没有唐长安城的大气恢弘,但仍不失为是建筑典范,特别是唐宋古城均已荡然无存的状况下,明清北京城的历史价值就显的更为珍贵。

从功能上讲,北京元明清时代的城市格局和功能,是依据封建制度下皇权至上的理念而设计的,它的平面布局和立体形态以传统政治权力为中心,故宫的太和殿是这座巨大城市的万千屋宇的核心,依次铺展开宫城、皇城、街市、官商居住区以及平民居住区等各类区域,其间穿插点缀以敬天地、敬佛老、敬鬼神的各种坛庙的“神圣空间”,形成规模大小不等、布局疏密适宜的聚落场所,以容纳当时的所有政治行为、民间仪式和日常性的城市活动。它严格依据这些活动的需求设置相应的场景,城市平面布局、天际轮廓线和建筑外立面形态都具有尺度、造型、色彩上的严格序列特征。这种典型的皇权时代的城市平面和空间形态,以及它所涵盖的功能性构成,可以说已基本不能适用于今天的城市生活,不能提供任何有现代意义的城市场所,不能容纳现代的城市生活方式。

三、面对现代社会要求的发展难题

北京的现实难题是迅速扩张的城市正在淹没着传统的文化形态,人口的巨

大压力促使城市建设必须大规模发展,这时开展的城市文化建设,首先就

面临着如何面对传统城市形态的观念问题。中国是发展中国家,城市化水平较之于世界先进国家,还有很大差距,与世界的平均发展水平也有差距。现在世界的城市化水平是54%;中等发达国家在60%以上:最发达国家已达80-90%,即使某些发展中国家也达到了45%左右。而我国的城市化程度经历了改革开放20多年的高速发展,2002年也才达到33%。城市化水平的高低,直接反映了一个国家的现代化程度,迅速、超常规地提高我国的城市化水平,是中国的建设者们十分急迫的历史任务。但是,高速发展的要求和正常的城市发展规律,又是很现实的矛盾,如果只单纯追求发展速度,而忽视了文化建设的巨大作用,那就会造成表面上城市暂时是发展了,但却严重缺乏持续发展能力。城市缺乏魅力,吸引力构成单一,人们和它的联系方式非常狭窄并呈现实用化和平面化,而不能成为人们心向往之的精神文化圣地。

北京的城市生活正在不停地发生着巨变,尤其是近二十年,北京早已不是那个“穿蓝色长袍的国度”⁵的首都了,而是现代中国的政治、文化和国际交流中心,旧日北京城破败的容颜,“刮风满街土,下雨一街泥”作为难堪的记忆,已经淡入历史的尘烟。社会制度的根本变革,为

北京的变化提供了坚实的保障和动力,那时的城市所没有的广场、公众会堂、居住小区、体育场、美术馆、超级市场、立体交叉桥、快餐店等等,已经成为这座城市必不可少而非摆设的基本构成要件了。在这个意义上,历史的“记忆”所该忘却了。

我们要将特别注意在城市的快速发展时期,不要忽视文化建设。如果“文化”在城市发展中总是“缺席”,就会造成城市越是高速发展,就越容易产生大量破坏“文化”的现象,反过来又促使城市发展更呈现劣质化倾向,形成恶性循环。比较起城市化发展程度的“硬性”问题,文化建设的“软性”问题要更具有复杂性、隐含性和艰巨性,也更重要。“文化”决定着我们要建设什么样的城市,“文化”告诉我们,什么样的城市更合乎人类

的精神需求,更具有人文关怀,能够更好地传承人类优秀历史文化遗产,特别是只有自己城市特色的文化遗产。这是我们每个人的事情,而不仅仅是学术界或者城市规划者和管理者的事情。

四、指导城市发展的精神价值依据

但是,如果只要满足现实生活需要就是一座城市的全部,仅此而已,那么每一代的城市设计者和建设者唯一能做和该做的事,就是不停地拆除昨天留下的建构物,扫除障碍,然后营造出崭新的、

巨型的、功能不断更新的,由金钱和技术材料进步成果做支撑的新建筑、新城市,否定昨天的一切,别无它责。

但历史告诉我们,时代进步并不仅仅是以技术进步程度作为评判标准的,人的生活的美满、幸福和有意义的程度也很难完全用物质条件去填充。技术价值与艺术、精神、内心情感的诸种复杂的价值观念和需求是不能等量齐观的,在时间上的意义永恒性也不能用一样的标准去衡量,就好比千百年前的有斧石镰在今天的技术价值等于零,而其精神、艺术、文物认识价值反而超过了技术价值那样,人类的精神性需求是恒久的,是永不能枯竭的,而现代人的精神养料,除了必须来自世界一切进步社会的优秀文明成果外,还必须从本民族的历史文化的"记忆"中汲取。

和迅速发生着巨变的生活相比较,城市外在形态的"记忆性"具有更鲜明的文化命题实质与实在性意义。从理论上讲,最好的城市应该是属于"生长型",而不是"拼装型"的。生长型的发展方式要求城市与所处环境完好融和,与历史的内在精神实质完好衔接,也一定在形式上有所继承和发展。建筑学界习惯使用的"文脉"概念,大致就是涵盖了这一价值指向。优秀的城市设计,向该有清晰自然的历史发展脉络,有昨天与今天天衣无缝的衔接方法,它不泥古,更不会臆造似是而非的假古董,不会只摘取某些古代建筑片断和零乱的符号去拼接"

古都风貌"。当然也不会简单地模仿外部世界的现成样式,以炫耀的方式伪装"新潮时尚",城市的形态可能会在某些时段中变化较快,但必然有稳定的内在的文化力量,在始终决定着城市的形态保持文化记忆的延续性,增加城市与生活其间的人们的亲合度,使外在形式不致在历史与现实之间、中国民族特色与世界其他民族的特色之间衔接得过于突兀乖张,不伦不类,以至整体形象缺乏"文化之手"的整合力,张扬零乱,而从根本上破坏并阻滞了城市的正常生长。

五、历史性巨变给北京城市发展带来的机遇和挑战

近代历史对北京城市面貌的影响是逐步加速的,在近半个世纪里有两次大的形态激变期,一次是在20世纪50年代,一次在20世纪80年代以后。

(-) 社会形态转变为北京城市巨变提供的第一个机会

上个世纪50年代初,对建设新北京的思路发生了严重分歧,以前苏联专家为首的一派坚持主张彻底改造旧城,建设"拥有大最产业工人的北京;而另一方则是梁思成、陈占样二位专家,他们二人都有着标准的欧美留学背景,却对传统的北京旧城极为尊崇。前苏联专家家认为北京的产业工人比例远低于莫斯科,他们提出,要在10-20年时间里,将北京4%的产业工人比例迅速提升到25%左右。

而梁、陈二位则提出放弃改造旧城,在北京城的西部另建新城,他们的建议未被采纳。之后,城中心的天安门广场的改造和东西长安街的再造和无数在

旧城圈里的大建设步步展开,其中长安街在广场附近路段,建成了"可让100人排面游行队伍并行"的宽度。⁶这一时期的建筑风格上没有确定性,新中国还在努力寻找属于自己的首都风格。

问题是改造旧域的成本实在太高,新城市也难以形成完整的风格。以后展开的各种主张和讨论都使问题更加复杂,今天一个要建设现代化新北京,明天一个罗马、希腊风格,再加上"夺问古都风貌",旧城已经残破飘零,新城建设也非常难以展开。这就是历史留给我们的一个文化难题。

〈二〉开放时代是北京城市形态巨变的更大机遇

20世纪80年代初,中国的改革开放大潮潮头渐起,从城市面貌上最先反映这一历史性变革的是"广东现象"。当时由于外资的进入,加上广州每年春秋两度的出口商品交易会的重重因素,一些建筑的"超前"实验就此展开。建筑师第一次有了不用政治因素优先的建筑设计机会。而其间的文化象征意义更具有代表性。早在20世纪70年代,为了"广交会"

的需要,作为当时中国窗口的广州就在修建一批接待设施时,就做了文化的试验,以流花宾馆、东方宾馆、广州宾馆、友谊剧院、白云宾馆等风格清新、造烈美观具有较明显的南国特色的,又具有现代风格的建筑为标志,开启了新一轮的城市形态激变期。后来很快影响到中国的其它的城市,特别是经济发展较快的上海、北京等城市。

〈三〉具有时代性象征意义的典型案例

这一轮形态的激变期里,北京的变化可以三个崭新的例证为标志,即为2008北京奥运会而营建的三大建筑,这是具有象征性意义的建筑:

我们还来不及把痛苦的历史和文化传统剥离开来,崭新的世界就展开在我们眼前。这才是一次的真正的文化交锋、文化机遇和文化考试。

国家大剧院(“蛋”方案),设计者[法国]保罗·安德鲁:

新中央电视台(“大鸟”方案),设计者[荷兰]雷姆·库哈斯:

奥运主体育场(“鸟巢”方案),设计者[瑞士]Herzog & Meuron 建筑设计公司。

这是一饮从“遭遇战”到文化交融,进而实现了文化跨越过程。这些奇特的建筑的山现,对于北京城影响将会极其深远,其文化象征意味要远远超越经济意义。对于它们的评价,我们还难以做出,

但我们知道,这是一次机会,虽然我们要冒险,但我们必须做。问题提出总比问题无法显现要好。

〈四〉更广泛含义的城市形态变化及其文化意义

我们同时看到,城市高楼的摩天化之风在不断蔓延,从北美地区发展到非洲、亚洲,"世界第一高"之争正十分激烈:宽广的高速路、高架路直接深入到传统城市的中心。而人在这样的城市氛围中日益感到渺小无助,宏大的尺度正在把人类心灵压逼到无限的小的程度。快速的交通方式,把闲适、轻松、安逸驱赶得了无踪影。谁都可以辩解说,难道谁能否定人类的伟大劳动和创造吗?那些耸入云端的高楼和无数华丽的人造交通工具,不是为人类提供了极其美妙的享受吗?不是凝结了人的大量智慧,这不正是我们所需要的吗?辩解者会认为,任何对这些文明成就的指摘不是心怀叵测,就是精神成了问题。确实如此,这是毫无疑问的。但在我们毫无察觉时,我们不是已经陷入了对这一切的迷恋和迷失吗?那些建筑物的尺度早已超过了实际的需要,而过多的张扬不是正在毁灭着建筑自身应有的美吗?

我们还知道,摩天楼的运行成本极其高昂,上海浦东的"亚洲第三"金茂大厦,一天的运行费是100万人民币:在灾难面前,解脱之道比较少;楼间切变风瞬息万变;光亮污染严重。除了土地效益较高

的优点外(其实高楼过了一定高度,土地效益也要随之下降),剩下的好处就是满足人的虚荣心了。而大马路和私家车充塞亦弊多利少,城市公路的"河渠化"隔绝了人际的基本往来途径,私家车战略对于大城市尤其超级城市是灾难性的,能耗非常不经济,易造成空气污染和交通拥塞,车路矛盾永远无法解决,这与便利往来的目的完全背道而驰,它的好处主要也就是利于郊游和满足虚荣心。既然在人为的城市中,过分张扬的建筑物和拥堵的东流已经超越了功能意义,经济效益也不划算,"为人"的目的并未准确实现,那么我们还在坚持什么呢?不难发现,我们不知道在什么时候、什么地方失去了那些最纯真的追求和温暖的胸怀,没有了对"适度"原则的基本把握能力。面对夸张的尺度,冷漠的材料、污染的环境、机器的霸权,我们该问自己了,当初所想象憧憬的城市就是这样的吗?建筑、机器、人,到底谁该是城市的主角。

我们必须坚持对于风格特色的爱护和执着.这并非文化保守主义,或文化中心主义复活。我们内心要清楚,真实的文化目标到底是什么。每个城市到底需要什么,大家都探索,但建设却不能停止,这是一种无奈。在这样的困境中,我们应该坚持,特色首先是一种客观的历史存在,虽然绝大多数的特色形式已经无法适应当今巨大的人口压力,也无法容纳不断拓展着的新生活方式,但它毕竟是我们的昨天,是先贤智者的思想

结晶和劳动果实。它是对世界范围的城市面貌趋同化的最后坚守,昨沃的"可识别性"的生命力,只能先保护,待后人智慧高过我们时,它的深刻意义可能会被不断地发掘出来,重新定义,焕然一新。

我们只能坚定地捍卫人类精神世界的丰富性,充分尊重所有民族的文化权利。好在我们也看到了在风格的困惑正大行其道时,文化的觉醒也在悄然到来。比如北京已修复了一段明代城墙,并要复建永定门什么的,尽管带着玩赏的心态,但比起当年无情的拆除,也算是文化心态的康复吧。另外,北京重新制订了《北京皇城保护规划》,其中对皇城保护区划定了9米的建筑限高,对一批破坏历史景观的糟糕多层建筑,也定出了拆除的期限。尽管这样做并不能从文化功能意义上使内容与形式相一致,因为传统形式的真实性在新时代里早被抽空了,也存在着形式大于内容的危险,但风格特色首先还是具有文明遗存价值的。

我们正在飞速建设新北京,但首先要弄清楚一个根本的问题顺序,不是先建设,再去考虑保护历史风貌;而是要先学会尊重历史,明白历史价值"不可重复"性的确切含义,读好北京城这部文化巨著,再搞建设,这才是对历史对当今对将来负责的态度。我们始终要坚持反对那种认为不拆除历史建筑就不能搞好新建设的方法,因为它和我们心目中要建

设的那个应该充满人类智慧的,有着丰富内容的伟人文明,是根本不相容的。

1 庄林德张东祥:《中国城市发展与建设虫》东南大学出版社,2002年8月,第3-5页

2 见张国硕转引:《夏商时代都城制度研究》,河南人民出版社,2002年4月,第6页,

3 张光直:《关于中国初期"城市"这个概念》,《文物》1985年第2期,第61页。

4 潘谷西主编:《中国古代建筑史·第四卷·元明建筑》,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2001年3月,第15页。

5 [英]阿绮波德·立德1901年著《穿蓝色长袍的国度》

6 见王军:《梁陈方案的历史考察》[中国]《城市规划》2001年第6期,第50页。